

所庆时刻念先生

刘卓军 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

1979年，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在北京成立了，这是改革开放后，在科学的春天中绽放出的一枝花朵。

“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客观上造成了十年的闭关锁国。最初的改革开放，哪怕是向外翘开了一个小缝，都会让人们的世界科技进步发展的高度和程度感到万分惊讶！如何调整我们的学科，配置好学科资源，更好地激发研究人员的活力，为祖国奋起直追的发展作出贡献，这些是当时每个有抱负的科研人员不能不思考的问题。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中科院数学所被一分为三成：数学研究所、应用数学研究所和系统科学研究所。当然，经历了“文化大革命”之后，历史造成的一些人员之间不太正常的交往关系需要调整，利用机构组成的变化来相助也是必要的。40年来，系统所的发展及其取得的辉煌成就，足以说明，当时成立系统所是非常正确的安排。即便是过去20年，在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这个平台的发展中，系统科学也凸现了其重要性和光荣。

在纪念系统科学研究所成立四十周年的时候，我们当然不能忘记研究所的老前辈。作为系统所名誉所长吴文俊曾经的博士研究生，我尤其愿意借此时机表达对吴先生的缅怀。

人的离世，标志的仅仅是生命的形式发生了变化。

2017年5月7日晨，数学家吴文俊在北京医院辞世。还有几天，他就该过第98个生日了。可他没能等到那个日子，真是令人惋惜。

三十年前的1989年10月，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举办庆祝建所十周年的活动，同时祝贺吴文俊教授和许国志教授诞辰七十周年。吴文俊和许国志与关肇直一道创建了中科院系统科学研究所。他们三人都是1919年生人，不禁让人联想到三国人物，他们虽然同年生，却未同年故。关肇直院士在创所三年后的1982年，抱憾病故了。否则，系统科学研究所的发展，甚至包括中国的系统科学的发展一定会是另外一番景象。吴文俊院士和许国志院士都是系统科学研究所的创所副所长，是系统所绝对的元老。尽管纪念建所十周年时，他们都不再担任研究所的领导职务，但他们是研究所存在的定海神针，而恰巧又赶上这一年是他们70岁生日的

年份，所以，一并庆贺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

记得举行纪念活动的那一天，所里组织了学术报告会。吴先生当然要登台做报告了，他的报告是回顾性质的，讲到了对数与形的认识，也讲到了他做定理机器证明的工作进展。演讲过程中，他没有忘记抬举他的学生们。那时，吴先生几个做机器证明的研究生先后都毕业了，胡森 1986 年硕士毕业，后来去了美国，王东明 1987 年博士毕业，留所后于当年出国去了欧洲，而且没几年就加入了奥地利国籍，并于 2017 年当选欧洲科学院院士。1988 年，我和高小山、李子明一道答辩，拿到博士学位的高小山办结留所手续后即刻去了美国，硕士毕业的李子明则去了清华大学教书，只有我留在所里“值班”。而我的留所还充满了戏剧性。

原本我打算跟着吴先生拿到博士学位后，回到我本科和硕士阶段学习过的计算机及信息技术方向上去工作。那是 1988 年，当时的王安电脑公司在得知我的求职信息后，请我到其位于北京建国门的一处非常气派的办事处谈工作条件：需要我经常世界各地飞，这个我喜欢。但当我问道，可否解决夫妻两地分居的事时，接待我的高级职员说，克服一下吧，挣那么多的钱，几年后还不是很好解决的小事。我犹豫了几天，还是回绝了。然后是总参在万寿路上的一个研究所，回忆不起研究所的编号了，只记得罗瑞卿大将的夫人郝洽平出现在那个所的花名册上，好像是 58 所，非常希望我去。58 所政治部主任跟我讲，你来是第一位博士，所里非常重视，两地分居的事，我们向总部打报告，争取尽快解决。这样的“条件”比较有吸引力，我答应了。没过几天，这位政治部主任还派人到我们所了解了我的情况，一切入职前的工作都在落实当中。就在这时，系统所业务处陈传平教授找到我说，你看老吴这么大岁数了（系统所有这样的文化，对很多老先生都习惯称呼老什么而不是先生，比如，称呼老吴、老许，而不是吴先生、许先生。不像现在，不称呼先生就不敢开口。我们读书做学生时，在背后也习惯称呼吴先生为老吴，其实那样反倒感觉更亲切）身边没个人帮忙不行啊。系统所向科学院争取了额外的名额，你就留下来干几年吧。的确，很纠结，我自己做了几天的思想斗争。吴先生跟我倒是什么也没说，他是那种不愿意给别人出难题的人。可陈传平老师都把话说到了那个份上，我也不能有别的选择了，留吧！留所总要办理一些手续，我在填写研究生毕业分配调查表中本人对分配去向的志愿时，写下了“可以留在所里”的字样，而吴先生在导师意见一栏中写道：“非常希望刘卓军同志能留所工作。”我决定了留系统所工作，而没有去总参的研究所，按现在的说法算是违约，对 58 所我只能是装聋做傻了。那一天，系统所办公室主任魏应培，当着我的面给吴先生打电话半开玩笑地说，刘卓军留所了，您要向总参那边说明一下呢。看不到电话另一端吴先生的表情，我想他或许会一脸茫然，他又能说什么呢？就这样，我留在了所里，我不后悔，因为随

后我有了 29 年与吴先生一道工作的机会，这对我是非常宝贵的生命片断。

除了工作之外，我和吴先生的个人关系，我们家和吴先生家的交往关系，也都是非常好的。比如，我把家里房门的备用钥匙放在吴先生家保管，受我的举动的启发，吴先生的老伴也把他们家房门的备用钥匙放在了我家保管。有一次，吴先生和老伴出门忘了带钥匙，这种钥匙互管方式还真的发挥了作用。

在所庆活动上，可能是出于鼓励吧，吴先生在报告中还美言了我对 Lorenz 方程求解问题所做的工作，并从混沌研究的角度肯定了这项工作的意义。应当是在演讲的最后，他更是极有风格地发表了“百岁宣言”，我的大致印象是：七十不稀奇，八十有的是，争取活过一百岁。多年后，从他的口述自传《走自己的路》看到了正式的版本：

七十不稀奇，
八十有的是，
九十诚可贵，
一百亦可期。

后来，1999 年在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为他祝贺 80 岁生日时，吴先生在口述自传中讲，他又修正了他的那个宣言：

八十不稀奇，
九十有的是，
百岁诚可贵，
百十亦可期。

改版后的宣言，把十年前的小诗，每句加了十岁。那天的庆祝吴先生 80 岁生日活动在友谊宾馆举行，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国家基金委、国家外专局以及数学界的许多嘉宾，还有来自国外的客人，共有 200 多人参加了庆祝晚宴。我是活动的主持人，记不得吴先生吟诗的情景了，很可能是因为场面大，忙晕了头。

吴先生的学问好，人缘也好，心胸还开阔，他能长寿，我们信，我们也为之高兴。说实在的，他能活过 100 岁，对此，我从来没有怀疑过。

吴先生的离世的确让我们非常怀念。2017 年 5 月 11 日，送别吴先生那天，有 1000 多人到八宝山向吴先生告别，其中就包括中共中央原总书记胡锦涛同志和原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同志。参加完告别仪式，温家宝同志还满怀感情地撰文纪念吴先生。他回忆了与吴先生的交往，包括以总理身份曾两度到吴先生家看望的情形。

温家宝在文中写道，“吴先生曾说：我要向我的老师陈省身学习。他直到去世

的时候还在研究问题，真的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不仅要死而后已，还要死而不已”。温家宝同志继续说，“吴先生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他深深热爱的祖国和数学，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思考和工作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如果生命再给他一些时间，他还会为自己的国家在数学领域做出更大的贡献。从这一点上说，他同样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不已”。

如果吴先生还活着的话，今年正好是他 100 周年诞辰。于他来说，他愿意为他所钟爱的事业孜孜不倦，死而不已。于我们来说，他的成就、他的精神一直影响着我们，他的学术思想将得以传承，并将启迪着我们及后来人勤奋工作、努力创新。

2010 年 5 月 4 日，国际小行星中心发布公报，将所发现并获国际永久编号的第 7683 号小行星命名为“吴文俊星”。当时，吴先生已经 91 岁了。我相信，在随后的几年，吴先生本人一定和这颗“吴文俊星”有着不断的“交往”，他的思想、他的智慧也一定已完整地存放到了这颗遨游在太空中的行星上。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有一句名言：“一个民族有一群仰望星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我们会情不自禁地时常仰望星空：吴文俊星在，吴先生没有离开我们，这是一定的。

按照吴先生自己的说法，他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他经常谈及一句话：“平淡出神奇。”这或许是他对后来人的一种告诫，只要踏踏实实、勤勤恳恳、坚持不懈，从事任何一门职业研究的人都能取得有价值的成就。

系统科学研究所未来的发展，系统科学事业的发展，何尝不应信奉平淡出神奇的理念呢？

2019 年 2 月 25 日